

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种批判性的解读

唐正东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里斯本小组从中心权力向外布展的角度把全球化管理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格雷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作用的角度把全球化管理成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哈维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角度把全球化管理成一种地缘政治方案,这3种解读模式虽然向我们展开了不同的解读视域,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缺点是,无法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理解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当下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也无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层面来深刻地把握全球化的本质内涵。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4-0001-06

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全球化这个概念却是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它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客观事实,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地缘性的政治方案?在弄清这些问题之前,简单地断言全球化的客观真实性,那就很容易掉进资本所建构的某种意识形态之中。学界的确有人一直在宣扬一种超级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近十多年来,我们中的有些人一直在谈论消费市场不断推进的全球化问题……但今天,这种趋同的过程变得更加快速和深入了。它已经远远不止是一种感受,而是成了一种更为根本性的世界观、精神状况甚至是思维过程了。”^[1]幸好这种观点在学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更多的学者愿意从一种更加复杂的角度来解读全球化现象。当然,即使在这部分学者中,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一主题,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通过对其观点的解读及批判,可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上获得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观点加以更为深入的领悟。

一、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现象

以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学者所组成的“里斯本小组”,以其《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

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该小组就是把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作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现象来加以认识的。下面,我们就来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一些解读。

对里斯本小组来说,当下的全球化并非早已开端的全球化历程在当下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而是一种跟以前的发展阶段有根本不同的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因此,他们在解读方法上是不具有历史发生学的思路的,而是专注于从经验的层面对当下全球化的“新”特征进行描述。他们与超级全球化的吹捧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并非对全球化的事实只做肯定的评价,而是同时也看到了它消极的一面。具体来说,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经济的全球化。“一种新的全球经济正在出现,它的主要活动主体就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全球网络重新改造了经济生活中所有范畴的产业与地域的组织结构……经济全球化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它把决定全世界千百万人命运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决策权力和统治权力都交给了世界范围的金融与工业网络系统。”^{[2]4-5}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的确把全球化管理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网络化进程,但这种网络化却只是从某一中心地带(即美国、西欧及日本的跨国公司)向四周扩散而成的网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状或球状的(无中心点的)的网络。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对全球

收稿日期:2015-04-1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02)

作者简介:唐正东(1967—),男,江苏常熟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经济网络的改写或建构,而不是对这个全球网络的特征进行客观的阐述与剖析。这便使他们在思考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时,容易把它理解为来自于中心地带的经济及社会权力,向四周或全球的扩散和征服的过程,而不是把它理解成征服与反征服并存的一种辩证的社会经济过程。

这一特征在里斯本小组对全球化的另一个维度即民主化维度的理解上也清晰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看来,“经济全球化只是世界新秩序和人类生活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是这种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令人吃惊的是这股新的浪潮可以追溯到70年代初期,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股新的民主化浪潮从南欧开始,首先出现在葡萄牙,然后席卷西班牙和希腊,后转移到南美,冲击到亚洲的一些国家,把东欧和原苏联冲垮。”^{[2]5}他们此处所讲的民主化进程显然是指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理解的那种“民主”,“化”到世界范围内的那种过程。他们对这一过程的单向性是确认无疑的,虽然对这一单向性过程的后果确实有较为复杂的理解。里斯本小组的确看到了这种民主化进程不一定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交往以及区域性的认同,甚至还可能产生新的文化霸权,但由于他们在基本解读思路上并不具备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他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并没有促进他们反过来重新思考民主化进程的复杂性,而只是停留在民主化进程是单向性的但它导致的后果是不确定的等经验层面的结论上。

我们不否认里斯本小组的确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做出过较为全面的论述。但应该看到的是,里斯本小组对这些多种多样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只是做了经验的描述,而没有对它们的本质做出深层解读。当他们试图去解释这些关系的来源时,往往就转向了由中心地带的权力向外布展的这种单一性解释思路之中。正是由于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思路,所以,他们才会在阐释这种全球化进程时,看不到对不断向外布展的中心权力的反抗现象。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里,中心地带与外层区域之间的关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个客观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的权力布展关系,是前者对后者的支配性影响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少学者从全球化这个概念中的“球”的特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地图”的特性之间的差别的角度,展开了很有意思的分析。譬如,美国学者戴维·哈维就曾指出:“名为‘地球升起’的NASA卫星图像将地球描

述为一个在空间自由浮动的球体。这一观念很快成为一种新意识的象征。但是,球体的几何学属性与地图的二维属性是完全不同的。除了陆地与海洋、云量与植被类型、沙漠与沃土所呈现的那些界线,它没有天然的界限,它也不存在任何特定的中心。人们愈益敏锐地感觉到迄今为止支配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所有界限与中心都是人造的,这或许并不偶然。”^{[3]257}

哈维的这种观点虽然并不代表从“球”而不是“地图”的角度对全球化进程的唯一解释,但它在方法论上对从中心权力向外布展的角度来解释全球化的观点已经能够构成有力的批评。里斯本小组的观点在这方面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尽管他们一再地强调全球化进程并非意味着经济及政治上的一体化、文化上的同一化,并清晰地表明这种进程只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但这些都无济于事了,因为他们讲的这种矛盾,其实只是一种对立,是经验层面上的事实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不是唯物辩证法意义上的那种内在矛盾。在《竞争的极限》一书中,里斯本小组从社会福利国家的消解、失业的增多等多重角度入手,对全球化的后果进行了剖析。如果从经验描述的层面来看,这不能不说是很详细的。但这些论述之所以没能反过来促进他们深化对全球化进程之本质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上面我们所谈到的他们在解读方法论上的单向性、非辩证性。也许有人会说,把全球化的事实描述清楚就可以了,但我们必须看到,此处的关键是你所做出的经验描述跟你所采用的解读方法之间是有紧密关联性的。里斯本小组显然是在接受了对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单向性解释之后,再去面对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这也许是他们过度强化当下全球化的全新特征而不把它放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来加以解读所付出的理论代价,正像当年亚当·斯密为了把当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解读为天然的、自然的、合理的经济制度而付出了不小的理论代价一样。

二、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学界也有人不是从经验的维度,而是从历史过程的维度来解析全球化进程的。这一阵营中的学者有很多,具体的解读方法也不尽相同。这里,我们以英国学者约翰·格雷的观点为例来展开相关的说明。在《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一书中,格雷从历史过程的角度对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做出了说明。

格雷首先指出,全球化绝不是一种在当下语境中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一个已经进行了若干世纪

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是一个进行了若干世纪的历史过程,目前有许多辩论都把全球化和在全世界实行自由市场的短命政治纲领混淆在一起。全球化应该被正确地理解为,在世界相距遥远的各地区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接触。它是一股潮流,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以来欧洲强国以帝国主义政策把自己的影响施加于世界各地的时代。”^{[4]257}这种观点显然与里斯本小组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虽然也看到了世界经济在全球化时代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但他们是明确地把全球化以前的阶段与全球化本身区别开来的。但格雷则不同。由于他是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已经历经很长时间的历 史过程的,因此,正像他在解读以前阶段的全球化现象时必然会发现曾经出现过的矛盾过程一样,他在解读目前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本身时,也摒弃了里斯本小组所采纳的那种单向性解读模式,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历史过程。“传统的思想家想象,全球化往往会产生一个普世文明,而且采取的方式是在全世界传播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践和价值。事实上,世界经济大都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全球化的市场并没有把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推广到全世界,而是把所有类型的资本主义,至少是自由市场的变种抛入了流动状态。”^{[4]257}

在格雷看来,美国要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与社会规范布展到世界网络中去的企图,不管是在客观事实层面还是在文化观念层面,都没有被欧洲及亚洲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过,千万不要以此就判定格雷是一个全球化的怀疑者。事实上,他也充分地看到了当下全球化进程所展现出的新内涵。他不仅在概念层面上明确地指出“‘全球化’所指的事物有许多。一方面,它指的是当代工业生产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以及贸易、资本、生产和信息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全球化还意味着几乎每一个经济体制都和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制联系着。”^{[4]67}而且,他还专门就今天的全球化与1914年之前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程度上的不同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至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与国内总产值的比值已经超过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开放式的国际经济中的任何时期,这一点是没什么可怀疑的。国际贸易的增长是巨大的和空前的。目前的世界资本市场也是前所未有的。”^{[4]74}

但是,格雷与里斯本小组不同的是,他更为深刻地看到了这一过程在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多个方面所造成的多元化结果。关于经济体制,格雷指出,“全球化决不是各个经济体制都要殊途同归的终极状态。全世界经济活动的普遍和程度相同的一体化

恰恰不是全球化。相反,在全世界,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的日益增长加剧了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尽管更全球化的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是要推翻或削弱国与国之间一些具有等级性的经济关系,如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但同时它却加强了现存的等级关系,并产生出新的等级关系。”^{[4]68}在格雷看来,资本、技术等因素之所以会在全球化的层面上自由流动,就是因为各个经济体在工资水平、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如果各地条件一致,在全世界投资和生产就不会产生利润。世界市场的兴旺依靠的是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别。这就是全球化潮流的动力不可抵抗的一个原因。”^{[4]70}

关于文化体制,格雷指出,全球化的确会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其主要的内容是文化的非地方化特征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全球化全部‘意义’的背后,只有一个单一的理念,即非地方化,就是从地方根源及其文化中把活动和关系连根拔除。亦即把直到近期还是局部性的活动转移到关系网中,这种关系网延伸到远方或全世界。”^{[4]69}但他并没有像里斯本小组那样简单地理解这一进程,而是清晰地看到了非地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全球化进程的确把以前处在局部性活动的关系网中的地方文化拉伸到了全球的层面,从而完成了非地方化的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在全球层面的趋同化。“全球交往的发展不会产生任何类似文化合并的现象。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传播的美国世界观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美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的解决方法,但这是与客观实际背道而驰的。这种美国世界观只不过是当前通讯技术导向中的短暂的、人工制造的东西,它不是通往普世文明的路标。”^{[4]72}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处于中心地带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向世界其他国家传输其资本、贸易、生产、信息等要素时,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把本国的经济文化带进去。因此,这一进程唯一可能的结果是促进本土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包括美国本身,全球化市场的结果都只能是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全球市场强制地把现代化加在各地的经济体制中,但它们没有复制旧的经营文化。新型的资本主义被创造出来,而旧的则要被毁灭。”^{[4]72}

显然,在里斯本小组看到中心地带权力单向性布展的地方,格雷看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他来说,经济文化的本土化并非原来意义的地方化,而是全球化所建构出来的本土化。这也反映了格雷所理解的全球化是一种兼具全球化与

本土化之内涵的真实的历史过程,而非这一过程在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中心权力的向外布展。从深层原因上来看,格雷更多地关注当下全球化过程的非经验性的、本质的内容,而且是一种矛盾着的本质内容,这跟他始终把它放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来看待是直接相关的。正是在这种解读思路的驱使下,当下全球化进程对他来说便不是表现为某种令人惊奇的新现象,而是表现为有待深入探讨并且需要找出其内含的客观矛盾的一段真实历史过程。

当然,如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格雷的这种观点,我们就必须看到,他尽管意识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性,意识到了各个本土区域之间真实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但他对这种矛盾或相互作用的本质的理解却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他在对“关系”的理解上尽管突破了基于权力布展的单向性关系的层面,进入到了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双向性关系的层面,但他对这种双向性关系的本质却没能做出深刻的把握。具体来说,格雷看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现象,并把它视为在整个全球化历史(包括以前的全球化阶段)中普遍存在的真实现象,但他并没有看出这种并存的现象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出这种并存并非是一种和谐的并存,而是一种内在矛盾不断深化的并存,是一种内在危机不断发展的并存。从根本上说,在对全球化的解读上,格雷尽管上升到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层面,但他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水平。具体到对上述“关系”的理解上,他把它从单向性关系层面拉出来,提升到了双向性相互作用的关系层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真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这种双向性关系不是一种天然的、当然的经验事实,而是一种被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所建构出来的“产物”。因此,只有把这种“产物”背后的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过程揭示出来,我们才可能真实地把握住这种“产物”的本质内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仍然难逃对当下全球化过程只能进行经验性批判的局限性。

事实也是如此。格雷在解读当下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混乱及无政府状态等特性时,的确只是停留在经验性描述的理论层面上的。他看到了在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等方面所出现的问题,“现在,劳动大军中有很多人甚至缺乏劳动-工资制度中的经济安全感。他们生存的世界到处都是打工、包工和组合式就业,这些就业形式与任何单一的确定的雇主都没有稳定的关系……对中产阶级生活的侵蚀是通过提高职业的不安全性进行的,它处在混乱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4]85}但他没有对产生这些现象的生产关系基础

进行剖析。他也对国家的无政府状态性进行了描述,“现在,民族国家必须在一个各种选择都不确定的世界里运作。在它们面前,并没有一个附有价格标签的选择清单。民族国家的政府发现它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不仅是有风险的,而且还是不确定的。”^{[4]88}但他同样也没有对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进行剖析。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格雷事实上并没有展开这种剖析的学术能力,因为他的方法论的基础只是历史主义的,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三、一种地缘政治的方案

在前面谈到从一种历史过程的角度来解读全球化进程的观点时,笔者曾说过,在这一阵营中,不同的学者是有不同的解读方法的,约翰·格雷的观点只是其中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观点呢?笔者以为,戴维·哈维从地缘政治规划的角度来谈论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当然,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等也曾提出过与哈维类似的观点。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一观点做个简要的阐述与评价。

哈维虽然主张从特定的地缘政治规划的角度来谈论全球化,但他认为把全球化视为一种历史过程也是可以的。“全球化可以被视作一个过程、一项条件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规划。正如我想要说明的,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但我建议首先把它当作一个过程。”^{[3]53}但应该注意的是,哈维这样说是有一个前提的,即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种停留在经验描述层面的实证过程,而是能够体现特定政治规划的历史过程。对他来说,全球化的历史本身就是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来表现出来的特定政治规划的历史过程,如果没有地理的扩张和重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获得发展,更不用说获得全球化式的发展了。

“它一次又一次地致力于地理重组(既有扩张又有强化),这是部分解决其危机和困境的一种方法。资本主义由此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立和重建地理。它创建了独特的地理景观,一个由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和领土组织构成的人造空间,这促进了它在一个历史阶段期间的资本积累,但结果仅仅是必须被摧毁并被重塑,从而为下一阶段更进一步的积累让路。所以,如果说“全球化”这个词表示任何有关近期历史地理的东西,那它则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3]53}

哈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这种政治规划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都存在着。而在

在他看来,那个叫作“全球化”或者说类似于“全球化”的东西是从1492年开始的,“这样,我们便看到类似于‘全球化’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内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出现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是从1492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贸易和商业的国际化进展顺利。”^{[3]53}哈维指出,在近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中越来越时髦的“全球化”概念,应该是指上述这种地缘政治规划的过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哈维还特别对全球化概念在学术话语层面的出现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之前,这一概念是不为人所知的。而现在,它不仅成了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主导概念,而且还拓展到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之中。在哈维看来,如果我们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当然的事实,并用这一概念来排斥以前经常使用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概念,那就会严重地束缚我们对政治解放之可能性的思考,因为“全球化”这一概念恰恰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体现地缘政治方案的特定概念。

“‘全球化’第一次为人们熟知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用它来宣传其信用卡的使用可遍及全球。随后这一概念便像野火般在金融和贸易刊物中传播开来,主要是为国家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作合法性论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化’帮助营造了那种围绕把市场从国家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个主题的企业家们的乐观主义氛围。简而言之,它成了与不断向全球扩展的新自由主义的美丽新世界有关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使我们觉得仿佛正在迈进一个新时代(偶尔有一点目的论的必然性),因而也成了在政治可能性上区分过去与现在的一整套概念的组成部分。”^{[3]12-13}

苏贾也有类似的观点,“如果没有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作为当代世界主导的全球性意识形态和最具影响力的‘观念景观’,关于全球化的话语还很不全面。”^[5]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对全球化进程进行政治学解读的理论倾向。在这种解读视域中,全球化进程不再表现为某种客观的事实,而是表现为政治权力的建构物。再进一步,如果考虑到政治权力之所以要进行如此的建构,只是因为它必须要遏制或支配已经存在于这一过程中的其他政治力量,譬如推动社会福利的力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政治学的解读视域很好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固有矛盾,即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矛盾和斗争。如果说,约翰·格雷解读了当下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复杂性,那么,哈维则揭示了这一过

程中的矛盾性或政治斗争性。如果就理论深度而言,哈维显然要技高一筹。实际上,哈维之所以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空间生产、全球化进程等问题展开了上述这种批判政治学的解读。

但同时应当看到,哈维的这种政治学层面的矛盾或斗争性,跟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观层面的内在矛盾或阶级斗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我们不能把政治学意义上的这种矛盾或斗争性,放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那么,我们不但无法回答这种政治矛盾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出现的,它为何以这种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我们事实上也无法认清这种政治矛盾的内在本质,以及找到解决这种矛盾的现实路径。

当然,哈维的这种政治学解读尽管具有上述局限性,但它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哈维并没有把这种全球化进程仅仅理解为政治权力的任意规划,而是充分看到了它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哈维是把全球化进程理解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地缘政治规划方案的。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条件的存在,那么,特定的政治规划方案也是不可能做出的。

在哈维看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以下4种转变,是构成当下全球化或者说新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条件,它们使这种新全球化进程变得更具诱惑力以及显示出了更突出的重要性。

首先,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为了应对国内的经济滞胀以及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带来的金融压力,不得不取消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哈维认为,这其实只是美国对现实压力的让步,但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层面却被修饰成了全球化进程对金融活动的解放。“正是这种金融压力欺骗了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在内),让我们相信‘全球化’是一个新事物,而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宣传伎俩,目的是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必要调整。”^{[3]59}

其次,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科技进步及产品创新的步伐和速度不断地加快,这也为当下的全球化提供了动力和条件。也许有人会问:科技进步是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那为什么偏偏在当下阶段才会出现所谓的新全球化进程呢?哈维认为,这根源于由教育的普及而带来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正是这种人才的扩散使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转让或引进。“有一些与全球军火贸易有关,但那些受过教育的、按照科学方法培养出来的、能够适应并能从任何地方吸收科技知识和专门技能的精英人

士的存在也与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速度有关……”^{[3]60}

复次,信息革命对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哈维首先承认了它的真实存在。也就是说,他是承认这种信息革命所带来的重要影响的。“媒体和通讯系统,以及最重要的,所谓‘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组织并带来了全新的要求和需要定义。”^{[3]60}但他之所以在信息革命概念上加上引号,就是想说明这一概念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经验描述性概念而出现,而是已经作为一个政治规划性概念而出现。因此,有问题的不是这一事实,而是政治权力对这一事实的建构和规划。

纽特·金里奇(曾接受阿尔文·托夫勒的建议,该人的右翼乌托邦理想完全依赖于“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的思想)说,新技术天生就是解放的。但是为了把这种解放力量从它的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就有必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以摧毁“第二次浪潮”工业社会的所有机构——政府管制、福利国家、工资谈判的集体机构,等等^{[3]60-61}。

再次,商品及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成本的降低使当下全球化进程变得可能。在哈维看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及消费的全球化,全球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也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移民化城市的数量也在增长。所有这些都是由商品及人员的流动成本降低所带来的,而这便是哈维所说的当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条件。他似乎并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存在对世界范围内人员流动的抑制作用等因素,而是专注于对因为流动成本的降低而导致的人员自由流动现象的研究,而且还认为这一现象比所谓的信息革命还要重要。

在阐述了当下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之后,哈维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些新历史条件对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意味着一种质变吗?他对此的回答是:这是一种有限质变。“我有保留地回答‘是的’,并立即要附加一条声明,即在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关联的社会关系中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如果确实有任何实质性趋势,那它也是再次声明19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价值,以及21世纪喜欢把每个人(以及每样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都拖进资本的轨道同时却又使大部分世界人口与资本积累的基本动态相比永远显得多余。”^{[3]65}仔细分析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哈维其实并不认为当下资本主义在本质层面上发生了质变,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如果其生产方式或社会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

那它是不可能发生质变的。更何况哈维在这段话中还明确地指出19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当下全球化阶段仍然有用。他其实本应该从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譬如,承认在现象层面上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但不承认在本质层面上资本主义发生了质变。但由于他的解读思路是建立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无法接受历史本质论,因此,他便只能在历史经验论的层面上既承认当代资本主义在金融体制、科技创新、信息革命等领域内发生的重要变化,又坚持认为它在生产方式或社会关系等领域未曾有任何根本性的革命。

哈维指出,只要认清了当下全球化进程的这种有限质变的特征,我们就不再会从后工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入手,而是会从基于地缘政治规划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过程。“全球化无疑是一场主要由美国……发动的地缘政治讨伐运动的后果……但如果没有来自各地的大量支持,美国是不可能把全球化形式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世界范围内许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或多或少乐于与美国政策结成联盟,并在美国军事和法律保护的框架之下运行。”^{[3]65-66}哈维对全球化的这种解释彰显了其鲜明的理论个性。他在政治立场上提出要建构一个更具普遍性和综合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跟他从政治规划的角度对全球化进程的解读有关系。

客观地说,在整个西方左派学界,哈维的这种解读算是比较深刻的了,因为他已经看出全球化进程中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关系。但略有遗憾的是,由于他像大多数当代西方左派学者那样,坚持反历史本质论的理论立场,因此,他无法从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关系。哈维的确把全球化理解成了地缘政治规划的方案,但在他的理论视域中,这种“政治”只是政治学上的“政治”,而没有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来加以解读。

参考文献:

- [1] KENICHI O.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M].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5: 15.
- [2]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M].张世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3] 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4] 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M].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5] EDWARD W S. 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钧,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81.